

## 新新界，新原居民？

「新界有牛」不是個笑話。學者梁啟智在2012年的研究發現，不同社區受訪者想起新界，普遍會湧出「牛」的聯想。「新界有牛，有禾田，客家農婦日落時挑着乾草回家餵豬」的圖畫儘管祥和美好，但終究不能罔顧現實：佔全港土地面積88%的新界，自1960年代發展新市鎮起已迅速發展，農田早已變成高樓，現在人口更多達370萬。

近日的新界更教人迷惑。高舉旗號要打擊新界「官商鄉黑」的朱凱迪，所揭發的橫洲公屋事件，讓大眾目睹新界鄉紳有左右公共決策的權利；然後接踵而至的新界新聞：棕地、套丁、政府在鄉事上的讓步等等，都在指向一個香港人熟悉又陌生的群體：新界原居民。明明在外貌、生活上無明顯差異，但無論是原居民生而擁有的丁權、或是維持數百年的氏族傳統、或以另一套語言模式操作的鄉事政治，都讓「原居民」成為「香港人」中難以理解也不可僭越的符號。

在新界議題繼續燒得火旺、原居民與非原居民日趨對立的今天，我們嘗試進入「萬惡」的原居民群體，了解800年單姓鄉村的傳統與變遷、找尋跟鄉事派持異見的原居民，也聽聽維護新界利益的鄉紳想法。也希望從中透射出新生力量——非原居民與原居民如何合作復興一條廢村？朱凱迪如何談希望中的新界？在此強調，原居民並非能代表「新界人」，在現今香港，他們更成為人口少數。但作為數百年前登陸小島的先來者，他們就如多面折射的結晶體，讓我們看到香港演變、地權歷史以及現今中港形勢，是如何把個體細細打磨的。

### 誰創造了「原居民」？原居民的身分構建及流變

從來沒有一個人生下來就被喚作「原居民」，也從來沒有一個地方自古已被稱為「新界」。在英國殖民政府於1898年租借新界以前，所謂「新界」，就是從屬中國新安縣的一片土地；所謂「原居民」，就是在新安縣不同村落聚居生活的村民。故此，要理解「原居民」的生成，就得理解英國殖民主義的操作。

《管治新界：地權、父權與主權》作者、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張少強認為，當下原居民正處於歷史上的尷尬位置：「新界人最驚就是『傳統』會用盡。把地賣完了，無錢又無地，如何支持宗族社會運作？而沒有『傳統文化』的封套，又如何合理化原居民的利益？」

母親是原居民的張少強說得投入，七情上面。說起種種香港人對新界依然懷着的陳套想像，他愈講愈激氣：「點解現在大家想起新界仍會想起一片田原！南生圍還有幾多個？都變了新市鎮！還有人說新界空氣清新環境好，大佬，你看深圳工廠的烏煙飄過來，再想想深圳的高樓大廈，其實新界不過是城中村！」還有的，以為新界人仍在耕田放牛，或在圍村內過着遵守傳統風俗的生活。

「現在原居民其實已跟一般香港人一樣！而且大部分原居民村都已變成外姓村，租給外人居住，自己則搬到檔次較高的住宅。」張少強說。他認為，今天「原居民」此詞，意義建基於他們所擁有的土地產權，而不是生活及人口事實。

### 互相定義的「原居民」與「殖民者」

而理解「原居民」一詞的衍變演化，在當下的流動意義，以及為何現在社會上造成原居民/非原居民的對立，就得先回溯到1898年英國殖民政府正式租借新界的時間線上。張少強這樣形容：「你說，是先有父親，還是先有兒子？許多人都說當然得先有父親。但其實如果沒有兒子，你又怎會為父親呢？」兩者互為因果，缺一不可——殖民者和新界村民的相遇，才造成「原居民」身份的形成。1898年，英國迫使中國簽訂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》後，新界居民曾頑強反抗，伏擊英軍，史稱「六日戰爭」。「因為新界人的抵抗，對當時殖民政府造成衝擊，於是港督卜力作出讓步，聲稱要維持華人鄉村傳統。」張少強說。

1910年英殖政府推出的《新界條例》就列明：「任何有關新界土地的法律程序中，法庭有權認可並執行任何影響新界土地中的中國習俗或傳統權益。」如條例容許新界村民能以祖或堂的名義把宗族集體擁有的土地（祖堂地）登

記入冊、又承傳《大清律例》中遺產傳子不傳女的習俗。不過，張少強指，英國人透過政策所界定的新界「傳統」，更多的是西方人眼中所以為的傳統。「任何政策都會有假設，造成定型。這種定型後來就變成所謂的『傳統』。」張少強說。他記得小時也聽母親村中人說過：「我們跟大清律例，土地只傳男不傳女。」「大佬呀！清朝都已覆亡，時移世易，你仍在講大清律例？不是吧？」張少強笑道。

新界原居民 Q&A你所不知道的「原居民」小知識

### 1. 有原居民不被認可為「原居民」？

到1972年英殖政府推出新界小型屋宇政策時，政府才把可獲得丁權的原居民定義為：「年滿18歲，父系源自1898年時為新界認可鄉村居民的男性原居村民」。同樣在香港開埠前已紮根的疍家人（水上人）被剔除在「原居民」的身分定義外，無法享有同等權利。

### 2. 新界的「界」有變過？

英國起初租借新界時，僅以地圖上一條直線表示新界的北面邊界；但後來英方提出應以天然邊界為依歸，打算把深圳等土地也納入界。最後雙方妥協，確定以深圳河北岸為界。新界南面邊界亦曾變更——本來界限街以北的地區屬新界，但1899年英國政府決定把毗鄰九龍的新界地區亦改劃作九龍區。

### 3. 「村長」不是傳統？

村長制度看似傳統產物，但原來非也。村長制度始於日治年代，為方便配給資源，軍政府於是設立村長制度。英國人重奪香港後決定延續村長制度，以村長作為官方行政代表。

然而另一邊廂，英殖政府在肯定新界原居民的「傳統」之餘，亦收緊其土地權益。1905年，英殖政府向新界土地業權人發出《集體官批》，正式把所有新界土地變成政府擁有的官地。新界村民本可自由使用土地，但變成在未經政府許可之前，不得更改土地用途；1923年，政府更加規定村民把農地變屋地之時需要補繳地價。自1960年代開始，英殖政府開始大量向新界村民收地，以建設新市鎮，因政府收地補償不合理，政府與鄉議局之間的矛盾愈趨劇烈——結果到1972年，為兌現收地時發出的「換地權益書」、安撫原居民，英殖政府推出「小型屋宇政策」，容許男原居民一生可申請一次建造一座最高3層，每層不超過700平方呎的丁屋，且毋須向政府補地價。

所謂「傳統」：維護土地利益的論述資源

丁屋政策不但給予新界原居民建屋權利，也再進一步圈起「原居民」不一樣的身分。「其實在70年代前，大部分政府檔案也僅稱這班人作『新界村民』。但就因為丁屋政策，需要界定誰可享丁權，才產生正式的原居民官方定義。」張少強說。而此定義也把原居民女性、居住於新界的非原居民、以至其他早就在香港居住的「原居民」如疍家人等排除在外。「不時有新界鄉紳就出來說，丁權是他們的傳統，必須維護。但丁權明明就是殖民者發明來紓緩原居民的政策。」張少強說。

張少強更認為，新界原居民口中所講的「傳統」，其實更似是「傳統」、「金權」跟「土地利益」相互勾織的混合體。「好多活躍的新界鄉紳都喜歡強調其傳統及歷史，一副『這是我們新界的事，外人不得插手』的論調。但其實他們所講的傳統背後有其實質的土地利益。他們要維護其利益，就要標榜這是傳統，這才能合理化在新界實行、跟市區不一樣的土地政策。」張少強說。

但誠然新界各民族村落也保存着古舊建築及傳統習俗文化，如祠堂、盆菜、打醮等，此話何解？張少強續道：「所謂『傳統』其實是反歷史的。古人不會叫自己做古代人。傳統的意思是多年來把習俗貫徹如一的實行，但這又怎可能？你看新界點燈，早已換了電燈泡，打醮的公仔，也變成電腦打印的。」他認為，新界原居民的生活習慣、居住方式早已跟「傳統」大相逕庭，但為了合理化從殖民時代確立的權益，「傳統」就變成原居民可用的論述資源。1994年陸恭蕙爭取女原居民也應享有繼承權。其間粉嶺圍就曾擺盆菜宴，邀請記者品嚐，以體現其「新界傳統」，也藉此擺出姿態，請外人不要干預新界事。

祖堂土地不可賣？「土地早已成為商品」

另一例子是，祖先為子孫留下來的土地，理應世代流傳；張少強就指傳統祖堂土地甚至不能出租給外人。但在龐大的利益誘惑下，此等考慮早已被拋到九霄雲外。「從鄉議局跟政府討論收地賠償開始，祖堂土地已從傳統祖先財產變成可賣的商品。」張少強說。然而，某程度上張少強亦明白原居民的考慮。「有村民跟我說，如果把田租出去不過1,000多元的收入，但如果賣出去可得1,000萬元！怎會不賣？對他們來說，保育人士就是阻人發達的一班人。」張少強說。

### 日漸邊緣的「新界代表」失勢的特權階級

香港回歸後，中央政府亦不願得罪新界原居民，《基本法》第40條亦列明「『新界』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保護。」土地、利益、傳統，三者互為表裏，便造成今天新界原居民這個時空上頗為特殊的族群。「近年因邊境發展、中港融合的大趨勢，這片新界土地更變得奇貨可居。政府要收地發展向來是燙手山芋，容易引起社會衝突；加上這班人有自己的組織、動員力、代議制度、土地資源，是絕對不容忽視的。」張少強說。但同時間，張少強認為原居民正處於歷史上的尷尬位置——論「新界代表」，隨着新界新市鎮發展，2011年數字顯示新界人口接近370萬，而原居民約為72萬人，所佔人口1/5不到，成為「新界少數」；而論土地，政府、發展商逐步收購，新界東北、洪水橋、元朗南等新市鎮又逐步開展，原居民手上土地資源愈來愈少。朱凱迪當選，更立下了鮮明的旗幟——大部分新界人不願讓原居民及鄉事派把持新界。「假若地賣光了，『傳統』又用盡了，原居民還可如何維持其特別權益？」張少強說。

身分是流動的，即使「原居民」標示了一班特殊族群，但此「特殊性」不是殖民歷史的特定結果，而且隨時代變遷，這班人的權益或會變改、命運也會因而不同。但身為社會學家的張少強亦提醒，不要輕易跌入「原居民都是貪心」等簡化的詮釋。各處鄉村各處例，過度簡化就是偏見的來源。

## Part 1

### 走入一條村……

背負同一姓氏，也就背負了家族共同命運——文氏從南宋時期流徙至四川、海南、廣東，然後其中一房落戶香港大埔，落地生根。當城市繼續混雜、髒亂，無方向的滋長蔓生。泰亨鄉文氏仍住在自築的防禦圍牆內，過着維持數百年的傳統氏族生活。今天戰亂不再，但家族卻面對另一種時代變遷：移民的一代、套丁屋苑建成、外姓人不斷遷入等。所謂的「圍」，在今天還有意義嗎？

### 傳統的延續與困窘：圍村泰亨鄉

10月1日，大埔泰亨鄉舉辦國慶盆菜宴，在祠堂對出筵開120枱，當中超過7成屬文姓人；現場掛滿喜慶紅燈泡、還有大台版卡拉OK讓鄉親父老登台高歌。「圍村人就係團結。呢個係我地傳統。」負責作中間人的文姓村民阿明（化名）說。

走訪不少新界村落、跟多個原居民談過，聽得最多的兩個字就是「傳統」。當「傳統」變成不易明瞭的理念、有時更成為區分他者的根據，或者另一做法就是走入「傳統」，以初生兒的發現目光參與鄉俗、節慶、「傳統」，重新了解原居民鄉村文化源流，以及當下面對的問題。讓我們從大埔泰亨鄉文氏開始。

### 祖先文天祥 居港超過700年

文氏是新界五大氏族之一，在大埔紮根超過700年。原籍江西的文氏族人可追溯到中國史上顯赫的名字——文天祥。「文天祥係我地嘅太伯父，我哋祖先文天瑞就係佢細佬。」熟悉傳統歷史、3位泰亨鄉村長之一的文仁炳說。

為了避過戰亂，族人不斷南遷，泰亨文氏從江西走到海南、於元朝期間再逃到香港。泰亨文氏更是首個發掘及建造大埔碗窰的氏族。其後因農地不足，文氏再搬遷到泮涌村，最後終於在泰亨鄉現址落腳。

位於大埔北的泰亨鄉幅員甚廣，「一圍三村」，分為祠堂村、中心圍及灰沙圍。泰亨鄉是單姓村，分為3房，基本上所有文姓村民都有親屬關係，在族譜上追溯得到——村民打招呼，都常以「阿哥」、「阿叔」、「叔婆」等稱呼

對方。

文仁炳笑說泰亨人較低調，但亦有不少威水史。「以前泰亨擁有好多田地，遠到可以入西貢北潭涌收租！大埔九龍坑、林村好多地本身都係我哋嘅。」文仁炳說。可惜一來族人漸漸賣掉土地、二來英國殖民政府徵收村中不少土地，泰亨今天的土地已大不如前。另一風光事就是「太和市」（即現今的「大埔新墟」），是由文氏族人聯同大埔七約於1898年共同創建的。

農村社會人情不再「但新界要發展，沒辦法」

泰亨鄉3位村長各有專長——文仁炳就算是村中傳統風俗專家，打醮、拜山、點燈，甚或釐清不同輩分等，都由他統理。「我好唔想流傳咁耐嘅傳統，係我哋呢代斷送。」文仁炳說。泰亨鄉每5年打一次醮。文仁炳特別着重要跟從傳統儀式，又對某些村落請圓玄學院搞法事的做法不以為然。「所以我會請村裏所有年輕人都參與打醮。唔係好多嘢都有咗。」文仁炳無奈的說。

文仁炳亦懷念他在村中度過的童年——當年泰亨鄉仍維持農村社會凝聚的生活形態，村民關係十分緊密，人情濃厚：「我哋做炒米餅，要家家戶戶一齊合作。記得我媽當時頂住我細佬推石磨，我哋就幫手做花生餡。鄰居就幫手搓餅，個個半夜3、4點就自動自覺嚟我屋企幫手啦！」文仁炳憶述。

現在當年村民的互助精神、家家不閉戶的事已成絕響。但即便如此，他認為新界要發展，要向前走。「呢個係社會趨勢，時代變遷，沒辦法。」

非原居民從屬地主村內「分餅仔」易起爭執

即使村中部分傳統習俗保存下來，泰亨鄉跟其他圍村一樣，隨時代變化。自1950年代起，因香港搵食艱難，泰亨鄉有班男丁走到荷蘭、英國、美國打拼，不少就此移民定居。近10年，泰亨鄉亦出現兩個「套丁」的大型丁屋屋苑，不少外姓人因此遷入。許多文姓原居民也不是在村中長大，而是在市區居住。幫忙作中間人聯繫的村民阿明，小時就跟家人在大埔墟居住。他帶記者遊走圍村，走過一間半塌的荒廢老屋。「呢個係我哋祖堂嘅書房，拆唔拆好？」阿明說。記者着急的說：「唔好！要留低呀！」但阿明氣定神閒的解釋，拆了起樓，賺到錢大家攤分；如果要復修保存，不但一點收入也賺不到，還要花費數百萬開展工程。「該由誰出錢呢？」阿明問。

阿明健談愛交際，村裏人人識他，打醮、盆菜什麼的都會請他幫忙，當個滿場飛的圍村公關。跟阿明在村裏走時，已有差不多10個人停下來，東拉西扯的跟他談上幾句。其中一個跟阿明打招呼後，他說：「他是鐵皮屋長大的！由細識到大，大家關係幾好。」

1950年代大量中國移民湧入——泰亨鄉一些農地及寮屋，就於當時租給他們耕作及居住。原居民及作為租客的非原居民在同一村居住，存在着一種自然而然的從屬關係。阿明家中亦有田地租予非原居民，家人不時籌謀用來建屋賺錢。「但我第一個反枱離場。因為唔公平。」阿明說。是因非原居民被迫遷？「唔係，係對我唔公平！唔知點解分餅仔，我個份比其他人細。」阿明說。每個祖堂涉及人數眾多，大家對財產分配容易起爭執，而且亦因不同傳統、有沒有兒子等因素而影響利益的多寡。

泰亨鄉的國慶盆菜宴在一班「鄉頭」在台上恭祝祖國繁華富強的一片祝頌聲之下開始。阿明包了一圍，邀請了他的租客同枱吃盆菜。在村裏，大型節慶都會以村裏停車場收入來支付開支，但金額往往不足，此時就需要村內地位較高的鄉紳資助。文壽強就是這樣的一個人。做生意的文壽強，每年中秋、過年、端午節等，也會派村中老人家利是、資助去旅行等；天后誕亦會包辦5隻乳豬，是村中有聲望的人物。

村中人物文壽強：地主不斷讓步界「租仔」

在阿明的引見下，記者終得在祠堂裏跟這位人物訪談。文壽強談及他對村中老人家的支持：「當然啦！佢哋全部都係自己人，係我阿婆、叔婆、阿嬸……照顧自己人係應該的。」文壽強在1960年代出生，年紀很小時就隨父母搬出村外居住。家窮，父母亦擔心孩子養不大，把他抱去過契天后娘娘，祈求健康平安。「大埔好多條雜姓村，但我哋係單姓村，都係姓文嘅，從同一個太祖文天瑞嗰度傳落嚟，都係自己人！」

文壽強亦滔滔不絕的辯駁種種坊間對原居民的想像。對他來說，原居民的傳統權利並不是一種特權：「丁權係70年代先確立，唔係傳統。但自古以嚟，包括英國佬嚟之後，我哋都可以喺自己土地建屋。丁屋只不過係延續我哋嘅權益。」文壽強又引用中國的「宅基地」政策，指所有中國人都可在自己祖籍鄉村上申請建屋，其他香港人回鄉亦會建屋，只不過原居民的「祖籍」在新界。「新界人一直都支持政府。冇我哋嘅地，香港唔會有水塘、新市鎮！冇中港口岸，香港又點可以發展中港貿易？點解呢啲有人講，反而淨係罵原居民？」文壽強氣憤的道。

文壽強認為圍村人一向是新界地主，多年來不斷讓步予「租仔」。「先係英國人，明明租借新界，但又廉價奪取我哋土地。」他說。他認為，反而一班非原居民得到特惠對待：「菜園村話要不遷不拆，咁就令到本身丙級地變成甲級地賠償，仲賠埋條村！呢班人仲要唔係原居民！」分「山頭錢」鼓勵後人拜山

新界原居民村落，每逢清明、重陽，都會拉大隊祭祖去。記者有幸獲邀出席泰亨鄉其中一個祖堂三槐堂的重陽祭祖活動。一大清早，村內就停了3輛大旅遊巴接載前往拜山的男丁，以及少數婦孺。傳統只容許男丁拜山？「唔係！只不過傳統只係會分山頭錢畀男丁。女人冇得分，嚟都冇意思。」負責統籌是次祭祖的村民阿林道。為鼓勵村中後人拜山，祖堂會派發利是給參與拜祭的男丁。以往窮，只會分豬肉；如今祖堂就會從其土地資產收入中，撥一部分作「山頭錢」。

泰亨鄉曾經顯赫一時，佔地廣闊，祖先們也因此葬在不同地方的風水穴——墳墓遍及馬鞍山、北潭涌、大帽山及落馬洲等地。上山前，記者就聽到大家辯論誰是誰。「嗰個唔係祖先太婆？」「唔係呀！唔係女人嚟！」「咩呀！嗰個係13世祖太婆。」阿林後來指正。「其實都幾亂，要查番族譜先知。」阿林笑說。對於年輕人來說，墳屬於誰，就更不重要了。小朋友愛玩，說鍾意拜山是因為「冇豬肉食」，「落山好好玩」。20幾歲的壯丁，幫忙剪雜草、拿燒豬，也說：「我都唔知係咩祖先嚟嘅！但我係嚟幫手，因為依家已經有乜人理，我更加要幫！」

山陡峭得人要拉着紅繩把自己扯上去。上山後，男丁紛紛脫衣，然後各就各位安放祭品。村民叼着煙，向天撒溪錢，喊：「祖先！今日假期，我哋嚟睇你喇！」然後，阿林就如學校旅行般點名，叫着年長村民的名字，其家人後代就報上出席人數，以計算「山頭錢」。原來大家雖屬同一祖堂，但亦有人互不相識。一個已搬出荃灣居住多年的中年男村民，就指着他旁邊的13歲男孩說：「我哋唔識其實。」再數下去，就說到可能他認識男孩的爺爺。另一村民忽然又說：「我阿爸同你阿爺，係親兄弟嚟。」數上去，大家的祖先總會有交叉點。

小朋友：「得原居民先有丁權，我都唔知點解」

拜完位於北潭涌的祖墳，大家在郊遊徑一個涼亭即場分起豬肉來。吃飽的小朋友對記者十分好奇。13歲的男孩問道：「我條村係咪好特別？呢個世界係咪有乜人咁樣行山去拜山？」他又忽然說：「我知道丁權唔係人人有，得我哋原居民有。我都唔知點解？依家唔係講人人平等咩？」另一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，則反而比外人對原居民的目光更好奇。「我好想知道你哋對我哋嘅睇法。依家出面個個都講『官商鄉黑』，但呢啲嘢我都唔知點改變。」他說。

拜山路程又遠又辛苦，是否真的可慎終追遠，增強作為文氏後人的認同感？已搬出去的中年村民說：「都唔係。一年一次gathering，當見吓親戚。」阿林也搖搖頭，說：「拜咗心安理得啦。當盡咗一片心，畀下一代知道要記住祖先。」大家離開後，山上還遺下溪錢祭品。到了下年清明雜草又會囂張的倒豎橫生，又得靠他們上來除草清理，讓祖先知道自己仍然被紀念。

“新界人一直都支持政府。冇我哋嘅地，香港唔會有水塘、新市鎮！冇中港口岸，香港又點可以發展中港貿易？點解呢啲有人講，反而淨係罵原居民？— 文壽強”

## Part 2

### 聽新界人說

上水原居民廖崇興，28年前棄肉茹素，7年前拒食米飯轉為食生，一路的修行。他說：「素食可以淨化地球，這是自己的幸福飲食之道。」退休後的生活，音樂是他的第二春，閒時會到上水梧桐河邊唱歌彈琴。

綠色生活與綠色印象，「綠色」與原居民，注定了的合襯？時代巨輪下的小齒輪，多少人冇得揀？又有多少人在揀？揀什麼？一個個新界與我，我與新界的小故事。花花世界裏的斑駁足蹟，生命色調其實五顏六色；新界人如何

塗抹？新界人說，聽新界人說。

在鄉事制度內外保育新界生態：一對原居民夫婦的經驗

上水河上鄉有一名人，就是「有錢祠堂都賣得」的侯志強；同村的亦有一個侯智恒，長春社副主席，一向推動保育河上鄉村的一大片塱原濕地，還娶了個志趣相投的太太羅惠儀，是香港大學嘉道理研究所助理總監，主力荔枝窩村復耕項目。跟侯智恒在塱原濕地走，禾苗顛動，腳踏在乾草上，雀鳥一群咻地飛過天際。感覺很不「原居民」的侯智恒忽然用起「原居民」的修辭：「把此地留下來，也算對得起祖先。」

兩種新界人：勢力人士與不願蹙渾水的平民

侯智恒，踢拖踩着單車在塱原上穿插，還會告訴你紅蟻丘、小白鷺與黑翅長腳鵝的分別，跟電視上掛粗金鏈開名車的新界鄉紳形象大相逕庭。「新界有兩種人。」溫文的侯智恒說：「一種是有能力獨立生活的，個『底』清潔，你就不想去理鄉事，如果理就要承受畀人搞的風險，另一種是有底有勢力的，用盡各種方法搵錢。但其實新界大部分人是平民，敢怒不敢言。」他自己就界線模糊——底子清潔，是專業人士，但又曾蹙過一淌渾水，加入鄉議局兩年、嘗試在制度內推動改革。

侯智恒在河上鄉出生及長大，童年爬樹、摘水果、跟同姓兄弟表親什麼的通山跑，笑指自己是「鄉下仔」。他最難忘的是當年入讀港大，身邊個個英皇華仁出身，都未聽過「上水」這個地方。侯智恒後來走上生態研究的道路，他指可能也跟小時與大自然相處有關：「我怕對人，相比之下對着大自然就容易多了。」畢業後，他先後在世界自然基金會及嘉道理農場進行生態保育工作。2000年，九廣鐵路落馬洲支線計劃興建，其中一段架空車橋打算橫越塱原濕地，結果在環保團體反對下擱置計劃，最終改為興建地下隧道。

這片濕地，其實就在河上鄉內、村民稱為「碑頭」的地方。「塱原其實是私人地，有的被發展商買起了。當時覺得很可惜，擔心田地會變成高樓。因為當時我已是長春社理事，加上跟村裏人又熟，好說話，於是便提議在塱原推行可持續發展工作。」侯智恒說。

推動塱原復耕 成雀鳥天堂

新界早已沒有人種米了，種菜的也是一班六、七十年代難民潮時移民到港的農民。他們一個個老去，不少農田也自此荒廢。侯智恒便嘗試推動塱原復耕——跟地主及農民合作，種稻米以及茨菇等傳統新界作物，而且着重可持續發展，比如說田地會留約兩成位置讓雀鳥棲息、或特地不去收割部分稻米，為禾花雀預留糧食。侯智恒愉悅的說：「以前禾花雀只得零丁數隻，去年已增至數十隻了。」塱原是聞名的雀鳥天堂，雀鳥種類超過全港的一半——至2014年，塱原的雀鳥品種多達299種。

但村民如何能抵抗賣地予發展商的利潤誘惑，甘願保住經濟價值低的農地？侯智恒苦笑說：「當初搞塱原的時候，也曾有勢力人士說我勾結村外勢力，剝削他們的資源。但幸好一直也有班村民支持。我對他們說，你任由田地荒廢、失去生態價值，政府遲早會收地建樓。你想我們村門前就是高樓大廈嗎？」政府現計劃收回塱原的土地興建生態公園，算是皆大歡喜收場——農民應可繼續耕作，村民也可獲得政府的收地賠償。

「鄉議局丟了新界人的架」

當時亦是侯智恒參與鄉事的蜜月期。他形容當時執事的人較有魄力，所以他就會建議把河上鄉發展成可持續發展村落，推動廢物回收、處理廚餘等，又想把村裏小學變成自然學校。但可惜，新人上場，處事作風大變，侯智恒滿腹大計只能落空。他亦只能無奈的看着800年村落的頹敗變幻。走過從前是農地的停車場，他說：「很痛心。這是不義之財。」

侯智恒也嘗試過在制度裏尋求改變——他曾受劉皇發邀請，擔任鄉議局的增選委員2年。想起那2年的經歷，他好氣又好笑：「你能想像鄉議局到現在都不用電郵嗎？到現在文件都是寄來寄去的，好落後。」然而鄉議局落後的不只是科技。侯智恒時，一班鄉紳同坐一桌，10次開會10次也吵架收場，有官員在場就罵官，彷彿破口大罵後世界就能為之震撼。「鄉議局不相信現代公共行政那套，不會做研究調查以理服人，以為講利益關係就可影響政府。」侯智恒說。所以侯智恒自知不能在制度上進行任何改革，兩年後還是從鄉議局中黯然引退。「原居民中好多叻人，但

爲什麼這個架構不能吸引這班人？因爲有能力的新界人，又怎會想栽進去？鄉議局所謂維護原居民利益，但其實更多的是去兇人，爲自己利益做事。鄉議局丟了新界人的架，對不起新界人。」侯智恒不留情的說。

### 新生原居民身分認同弱在局外改變新界

侯智恒的太太羅惠儀是香港大學嘉道理研究所助理總監，主理荔枝窩村的復耕項目。她的母親是稔灣村人，也是原居民；而自己結果也嫁了個原居民，意外的跟新界結下不解之緣。

對於女性原居民不能得到丁權、甚至不能入祠堂，她也不以爲然：「我們這代可能着眼點不在此，甚至有點不屑，反正數目也不太大。」但是兒子出生後，她也有帶兒子回河上鄉點燈。「我也不理傳不傳統，對我來說是趁熱鬧而已！」羅惠儀笑說。

羅惠儀就如許多新一代原居民，對其身分不抱特別認同，對傳統也抱着若即若離的態度。但她認爲許多年輕原居民不願參與傳統、進入鄉議政治，不等於他們不想改革新界。只不過，改革不一定「入局」，在制度外面也能推動改變，如他們推動的荔枝窩復耕計劃。

### 原居民不一定是環境破壞者

羅惠儀無論是在工作，或是生活環境上都跟原居民緊密相處，爲此她亦想爲原居民平反。「市民一般都認爲原居民想破壞和出賣自己土地。但其實香港絕無僅有的原始森林，差不多全部都在原居民村落的風水林找到——如深涌和荔枝窩的風水林。不管他們是爲了風水還是其他原因，有這樣的自然生態，都是村民的功勞。」羅惠儀說。

即使新聞上常讀到原居民與發展商聯手套丁、倒泥頭、把農田改做爛車場等事，羅惠儀亦說其實他們不是始作俑者。「如果不是房地產市場過熱，利益誘因大，我相信原居民不會輕易破壞自己土地。到底香港高地價政策是元兇，還是原居民是元兇？」羅惠儀說。

羅惠儀認爲，目前新界最大問題不是官商鄉黑、也不是過度發展，而是無論是市區人或新界人，都對新界缺乏想像力。「許多村民坐定定，等發展商來收地；城市人就繼續認爲新界人懶，貪心，破壞環境。大家都沒有想到村落是否有更多可能呢？搞復耕？搞 artist in residence？」羅惠儀說。

並不是所有原居民都只顧發展賺錢，也不是所有原居民都對受污染鄉郊置諸不理。但要直搗制度的核心太複雜，或者在這之前，仍可走蹊徑、抄小路，把新界一點點的復原過來。

### 一對兄弟，兩種價值保育派鄧達智和鄉事派鄧達善

有種兄弟，叫做鄧達智和鄧達善。元朗屏山的鄧家一共有16兄弟姊妹，出了名的有兩人：哥哥鄧達智，著名時裝設計師，常在專欄中痛斥新界鄉郊在官鄉合作下被蹂躪毀壞；弟弟鄧達善，屏山鄉事委員會副主席，愛國愛港鄉事派，近年被捲入橫洲摸底、天水圍泥頭山等風波。約訪問之時，鄧達智指兩兄弟「心性與價值觀南轅北轍」，希望分開訪談。記者於是分別跟兩兄弟見面，內容的確相去甚遠，但也異中見趣。

### 鄧達智：發展不等同破壞鄉事派應顧及村民及環境

高大魁梧的鄧達智一身素色黑衣，好像比屏山或西班牙式丁屋前衛有型得多——但他一開口談新界，憂慮得緊皺眉頭，又忽然變回一個平常鄉民。「絕大部分原居民都分唔到咩利益，都係勞碌平凡咁過日子，仲要抵受住外界污名、環境惡變。」鄧達智說道。

熱愛屏山的鄧達智就曾目睹新界鄉郊是如何遭逢巨變的。「80年代中，元朗開始有貨櫃場、爛車場、貨車場。魚塘填平咗，田都變成停車場。」去年的橫台山車禍發生後，鄧達智就曾在專欄中痛斥車禍其實是「官鄉勾結」的後果，因政府縱容物流業在民居附近設址、投機的鄉村人士於是把綠地變成棕地。他更有位伯娘在家附近被貨車輾斃。

### 田地變停車場 「呢啲錢唔公義」

「呢啲錢係不公義嘅錢，對環境同社會都唔公義。」鄧達智憤慨的說。村民不但無奈承受環境破壞的惡果，而且原來許多受破壞發展的土地屬「祖堂地」（由源自同一祖先的原居民男丁所共同擁有的財產），利益關係千絲萬縷。

「祖堂地會先出租畀二房東，再由二房東以另一租金租出去。結果呢個人嘅後代就可繼承豐厚利潤，但呢啲錢唔會分畀祖堂。我哋有祖堂田變成停車場，但我們唔可以say no，因為會得罪人。」他又嘆道：「如果我唔係同元朗咁根深柢固，我一定會離開。」

某程度上，鄧達智理解為何弟弟選擇鄉事這條路。「有啲嘢，唔係呢個人做就第個做，唔係我細佬都有第個做。」他又說：「但係我希望佢哋可以為環境同啲呢度生活嘅人諗多啲，唔好只顧自己利益。佢哋將發展等同破壞，好錯。」

鄧達智也不會把矛頭只指向一班鄉紳。「部分原居民貪心想賺錢係一回事，但係政府又點解會發牌，條路咁細，連車行都有問題，點解會容許呢啲地方都變成貨車場？」他說。

鄉事派並非萬惡如同制度「潤滑劑」

但鄧達智不會全盤否定鄉事派對新界的貢獻。「政府好軟弱，有時鄉事派仲硬淨啲。比如話起村屋要起路，由鄉村人士幫你申請，事半功倍。如果自己向政府申請，要經過好多部門。」他說。

鄧達智又記得，小時候英殖政府的水務局職員入屋調校水喉，攤開手掌等收錢，不然不放水。試問他媽媽作為農村婦女，又怎會懂該如何做？結果還不是靠村中人士幫忙處理。「我都希望可以有一個乾淨廉潔的制度。但有時我哋的確需要機油，幫手去潤滑各個機件。」鄧達智說。

一邊是傳統宗親社會的人情關係、另一邊則是現代的法治文明，兩者不時相沖撞擊。

沒有土地 就沒有原居民族群

儘管對新界部分原居民的行為為之厭惡，鄧達智仍然擁護其新界文化，希望新界傳統能繼續傳承下去。「呢種傳統重唔重要？咁樣嘅氏族生活傳統，係全世界都已好少有。就好似你問我嘅生命應唔應該存在咁，但未必好有意義，但既然佢存在，就畀佢繼續存在落去。」鄧達智說。

至今每年清明重陽，鄧達智都會盡量前往拜山，感謝祖先遺蔭。只不過，在新界村落早已融入都市經濟的今天，傳統村落仍可繼續存在嗎？「我哋祖堂有好多土地。我諗維繫住大家嘅係共有財產，呢啲土地唔可以賣，只可以租，係大家嘅。冇土地，就散啦。」鄧達智說。

鄧達善：我們沒有特權 有的是傳統

戴着名貴腕錶、手挾Gucci皮包的鄧達善，努力地在一間賽車主題cafe的餐桌和紅色皮椅之間擠過去。終於坐下了，他說：「我哥話你哋係持平嘅媒體，所以我接受你哋訪問。噃！我希望你哋幫我平反呀！」

之所以要平反，是為早前有關他的報道——有指他涉及天水圍泥頭山及洪水橋劊房的事件。「我係鄧輯五祖堂堂嘅其中一個司理，做咗兩年。阿公太多物業，有超過500塊田地，所以我哋要幫手處理。」鄧達善說。天水圍泥頭山及洪水橋寮屋皆屬祖堂土地，都已於不同年代出租予祖堂兄弟，部分人會充當二房東再租給別人，所以司理甚至承租人對土地用途未必知情。「天水圍泥頭山已經廿幾年，當時我連村代表都未做，根本乜都唔知！」鄧達善說。

參與鄉事因樂於助人

鄧達善從1999年開始成為村代表，加入鄉事派。現在更成為屏山鄉事委員會副主席的他笑說：「我係全屋企人最積極參與鄉事嘅。可能我天生係咁啱……我鍾意幫村中兄弟，幫到人自己開心。」比如說是僭建問題，他就會作政



府和村民間的和事老，好聲好氣的勸告村民清拆，又請政府酌情處理。

鄧達善亦牽涉在橫洲公屋「摸底」風暴之中，是政府會面的5位鄉事派代表之一。「我唔認同係摸底。政府係港英年代已經咁樣做。鄉委會係法定諮詢機構，呢啲事涉及鄉村，當然要先諮詢我哋啦！」鄧達善說。他又指他沒有理會曾樹和是否在當地擁有貨櫃場生意。他反對橫洲興建公屋是因為見元朗經已「塞爆」，希望政府能先做好交通配套，才興建公屋。

鄉村制度是「家事」

對於外界對新界「官商鄉黑」的指控，以及候任立法會議員朱凱迪要「改革鄉議局」的宏願，鄧達善滿臉冤屈的道：「好似我哋元朗27鄉，主要係原居民村。原居民嘅村代表人數一定多過外來人。朱凱迪要入嚟管，憑咩？呢啲係我哋傳統習俗！」但是當下新界新市鎮眾多，原居民反成少數，為何鄉議局仍「代表」新界人跟政府洽談新界議題？「我知道，我都睇到呢個趨勢。但我哋有自己傳統，基本法都有保障，最起碼我哋嘅傳統權利要去到2047年。」鄧達善說。

保育責任在政府

保育責任在政府鄧達善續說：「丁權唔係特權！呢個係以前英國人入侵新界嘅賠償條件。呢啲係以前傾落嚟嘅做法，如果話 家先畀我哋嘅話先叫特權！美國政府都有畀紅番特惠福利，澳洲土著都唔使交稅！」但說到丁權無限而土地有限的問題，鄧達善亦承認永續丁屋政策的不可能。「咁都有辦法，最基本希望保持到2047年，到時點做就點做，要延續、取消、定向高空發展，我哋都要接受。」鄧達善說。

說到他哥哥希望保護鄉郊環境，跟鄉事派支持發展的價值有分歧，鄧達善說：「保育係啱，我都支持綠色環保嘢！但責任係喺政府度。假如政府見到人填泥，佢立刻執法，就唔會有今日咁嘅情況啦！」他亦見新界變遷，指現在元朗環境跟小時大不同，「好多嘢變晒」。「但我支持政府合法發展。城市要發展。我希望政府做好配套，搞靚個社區，大家安安定定。」鄧達善這樣描述他理想中的新界。

時速40公里的新界風景 64K巴士司機：「新界人係純啲」

住在大埔或元朗鄉郊的人、或愛到新界郊遊的人，應該不會對64K巴士陌生。或許這不是一條最舒服的巴士路線——路窄彎多，不時上落斜坡，全程停靠站更多達53個。據說不少乘客都會私備一支萬金油。但是當兩層高的巴士剖開田野的窄路，徐徐的從新界東行往新界西，我們得以時速40公里的速度，閱覽新界：看見新市鎮的密集高樓化成田野、如春筍冒起的西班牙別墅、銅鑼味重的割車場和吊臂車公司。開了64K線16年的華哥是雙重意義的新界人，既是元朗村民，亦是標誌性新界巴士路線的司機。「新界人係純啲。」這是他以時速40公里所得的體會。

九巴64K服務大埔及元朗鄉郊村民，已超過63年——64K前身23線於1953年投入服務，來往新界東及新32界西，讓散居在錦田及林村的村民方便出入墟市。華哥在元朗大棠圍村出生及長大，笑說自己是「鄉下仔」，想不到長大後開一架鄉村巴士。他1999年起開64K路線：「起初見到條線都驚，又落斜又上斜咁，比較危險，路又窄。有成53個站……即係開一轉車就有超過100個站要停！」話雖如此，若要轉換路線，華哥亦不願意。「圍村人始終好，民風比較樸素，冇咁多嘢諗。城市有好多所謂有文化嘅人好鍾意投訴，反而呢度人較有禮貌，好多『唔該』前『唔該』後。」華哥笑說。

乘客分享田裏作物

鬧市巴士載滿趕往上班下班的急躁乘客，在鄉郊農田間穿越的64K卻不一樣，其緩慢拖沓的路程好像容許了一班不一樣的乘客存在。巴士司機在同一路線來來往往，對每一張面孔都熟悉。「初初揸個陣，都有唔少客家農婦成支擔挑咁放上車，嚇死你！都有唔少人拎住菜籃拎去大埔墟賣菜。好快賣完！啱啱出完去，過一陣我又車番佢入村。」華哥說。有的談得來的乘客，更是熱情大方，把田裏剛收成的新鮮菜、大蕉、楊桃都分給華哥。華哥每次皆拒絕好意，但村民乾脆把作物丟到司機位，拍拍屁股下車。「我唔可以落車追佢嘛！惟有要囉。好甜啲楊桃，冇得頂！」華哥笑說。

目睹新界變遷：「以前全部都係綠色」

不過，隨着都市的界線一天一天的延伸，新界再也不是那種陳套的綠田園想像。過了嘉道理農場，64K剛攀上山丘，放眼就是平原一片——但過往的蔥綠已生了鏽迹，變成爛車場或貨櫃棕地；只得雞公嶺和大刀叨兩座高山，依舊盤據其中。「??家風景冇咁靚囉。以前一望落去，有山有草，全部都係綠色。家起晒丁屋，隔離左右都有發展。林村許願樹一帶以前係草地嚟，??家變咗做大球場！」華哥惋惜的說。屋多了，人流也增多。以往64K巴士大概20分鐘一班，現在已加密至10分鐘一班。鄉村人少了，搬入的更多是外頭急躁的市區客。「都有話傷唔傷心嘅。咁你始終要發展，要向前走，冇得退後，呢個係一定啦。」華哥說。

### 巴士恍如搖籃 孩子一夜長大

雖然眼見新界風光不再，但見證着乘客成長，華哥總是笑逐顏開。64K恍如時光搖籃，在顛簸間，孩子忽然長大了，到市區闖蕩過後又回來。華哥記得一個住林村的小學女生，因分段收費車資不同，她每次上車都會大喊：「林村！」華哥說她聲音特尖，他每次也會模仿她說話語氣：「林村！」把小女孩逗笑了。現在這女孩已長大，結婚生子，但回林村外家時仍會搭64K，跟這位愛作怪的叔叔問好。有時，華哥則是看着老人家慢慢老去，從扶拐杖變坐輪椅，然後再也見不着他。華哥對此也不無感慨。

開了16年，華哥早已「掛牌」，專注的開64K路線，繼續每天在蜿蜒的林錦公路徐徐前行。原來他有個心願——雖然每天也路經，但他從來沒有到訪過梧桐寨瀑布。「聽人講話好靚！想搵一日，同老婆同個仔一齊去。」華哥笑說。

年輕原居民：「我已ready好帶丁權入棺材！」

香港的原居民人口從來是個謎，沒有官方數字——但根據思匯智庫的調查，與丁屋利益相關人士約有72萬人。除了在電視機上所見的口氣大的幾個「鄉村代表」外，其餘芸芸數十萬新界原居民又有什麼想法？

28歲的King，跟他所住的村並不親近，甚至有個搬到市區地鐵站上蓋物業的夢。雖有丁權，但King卻不認為因此他有何着數：「或者我會帶佢入棺材！」或許King的故事，能讓我們看到不少新生代原居民的想法。

King在元朗八鄉一條原居民村出生及長大，小學也在村校就讀，其後才轉到元朗市區的中學上課。村校早已經被殺校，King可惜的說：「變咗做倉地。」我們走到緊鎖的大門，只得兩隻唐狗好奇地搖尾，以為我們帶着食物。

### 不愛參與村中事

King對自己的村不太有認同感。「我唔癡呢度呀，唔會好參與村內的習俗。上次拜太公已經係好幾年前嘅事。我哋拜個太公，我都唔知係乜水！」

儘管如此，King在土生土長的圍村裏遊走，還是有種自己人的駕輕就熟。他指出老圍的位置、拜神的地方、誰家的村屋起了5層高。還有村長——他跟也曾是村長的父親都是村中德高望重的人物。「以前有咩節日，佢都會出嚟煮盆菜。仲有邊個屋企吵架、屋企電器壞咗，佢都會好肯幫手。」King說。

雖在圍村長大，但King從不認為自己跟市區人有多不同。直至上大學，發現樓價高昂，才突然想起自己的「原居民」身分，有權建屋。但先不計建屋成本數百萬元要自己負擔，排隊向政府申請批地更是遙遙無期。

### 有丁權未能建屋 賣丁情有可原

截至2015年2月底，地政署正在處理及有待處理的丁屋建屋申請合共有12,586宗。「起到丁屋，你估中獎咩？」King說。不但未能建丁屋，King更發現自己原來不能排隊輪候公屋、更不能以綠表購買居屋。原來所謂「特權」的反面，就是一般權利被褫奪。

就如大多數的新界鄉村，King所住的村亦有人打丁權主意，向男丁收買丁權「套丁」，以發展較大規模屋苑。「曾經都有人問我賣唔賣，開45萬。我都有啲心郁郁。但屋企人勸我唔好賣。因為賣咗，就好似唔再係條村嘅人咁，唔可以喺條村度落腳。」King說。但King覺得無所謂，因為他早就希望搬出去住。「可能由細到大住慣鄉村啦

，我鍾意喺市區住，最好就係地鐵站上蓋嗰種！」他說。他亦認為賣丁對丁來說，情有可原：「因為對我嚟講，呢的唔係好大嘅利益。其他人做我都唔會反對，因為反正自己冇丁權但起唔到樓，畀人哋起又有咩所謂啫。」

### 不願靠土地賺錢 寧為理想打拼

如戲劇情節般起伏，King本以為自己是有丁權冇丁屋的原居民；但數年前，他才發現原來村內土地他也有份：一塊土地1,000呎、另一塊3,000呎，足夠他起幾棟丁屋。但因家庭關係複雜，這片土地並未能發展。擁有4,000呎地，足以讓King唔使做等收租過世，教人雙眼發光，但King卻不以為然。一來他怕手續煩，二來他覺得做人不應靠收租過世，他寧願花更多時間、精力為自己理想同事業打拼。「如果有人搞，就比佢搞。如果後尾冇，都唔緊要，其實我都ready將個丁權帶落去棺材。」King瀟灑地說。

### 鄉事制度迂腐「怎可能去改變呢？」

橫洲事件被各界質疑政府向鄉紳勢力屈服，而不是為公眾福祉；還有倒泥頭被縱容、政府為錦田套丁屋苑鋪車路等新聞——作為被迫負上共業、污名的原居民，King如何看待？「我都好討厭官商鄉黑，唔鍾意依家社會咁樣嘅氣氛。但我唔係以原居民身分去睇呢件事。我都唔會篤住自己個鼻話自己係新界原居民啦！」King說。但身為鄉事體制內的一分子，原居民不是比其他人多一重義務改革嗎？「整個系統好迂腐……怎可能去改變呢？大部分都要上班，沒有氣力去做什麼改變。」King說。雖然如此，他亦有在立法會選舉中投希望改革鄉議局、打擊官商鄉黑的朱凱迪；不過原來他不知道「村代表選舉」的存在，不曾參與當中。

King不知新界將來會如何，但他希望原居民傳統能繼承下去。「家天后誕都有咗原有功能，好似做show咁。但我覺得呢啲傳統鄉俗係本土獨有嘅嘢，冇咗會可惜。」King說。

### 原居民藝術家鄧國騫的「未代」身分意識

混合媒體藝術家鄧國騫自小在錦田圍村長大，作為原居民的新生代，在圍村獨特的生活經驗與現代教育的理性思辨之間搖擺，構成他對原居民身分的相信與懷疑。那聽來矛盾的狀態，是他一直以來的藝術個性，也同樣是他處理個人身分認同的方式。

### 18歲出城 覺醒身分意識

「我真正意識到身分議題是大學時，第一次去中上環看展覽。迥然不同的城市景觀與面孔，令我很震驚。意識到價值觀、人際關係、與生活要求上的分別，當時會問自己：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不同？」他說，18歲前的圍村生活，認識的人都安於現狀，不會覺得自己需要「出城」。

當時的元朗還是個偏遠之地，出入要轉乘幾程車，動輒個多小時。城內城外兩片天地，城內人與事都差不多，原居民是很模糊的概念。

原居民概念，是從事藝術創作幾年之後才出現，「開始有人問，原居民身分對你有什麼影響？」鄧國騫說。自那時起，他才開始梳理自己「原居民」的身分。身分概念再思考，如今梳理得清晰的個人身分認知，其實是從現在詮釋過去，如同現代人去解說歷史。

### 傳統活動尚存 傳承愈見馬虎

構成「身分」總有條件，一些可供辨認、且集體共享的特徵。對鄧國騫而言，原居民身分的見證與延續可歸納為兩個層次——傳統習俗生活經驗與當中的世代傳承。但他坦言，這一切都經不起着重理性與資本主導的現代社會的考驗，正步向沒落。

生活當中，節日的盆菜聚餐、十年一度的打醮盛況、村民寬闊的居住空間以及親戚聚居同一村落等等，這種異於一般香港人的特性，都是構成「原居民身分」的例證。鄧國騫相信傳統活動的存在價值——能夠促進宗族成員聚首，營造融合、團結的氛圍；但也感慨傳統意義的失落——在現代理性的思辨下，怪力亂神的傳統開始失效。

受過現代教育薰陶，鄧國騫也不得不承認，不少所謂的傳統，諸如食盆菜，其實只是約定俗成的符號。甚至，打醮時抬鬼王遊街的行爲本身象徵的是叛逆，但在文明社會的秩序之下，有以傳統包裝其叛逆性質的嫌疑；所以他說：「作為我們這一代，其實不知道要做什麼，傳承的概念很弱，大家做開就做，其實已經不明白為什麼要這樣做？」

此外，習俗傳承如同重複機械動作，當中細節愈見馬虎，消費意味濃厚。例如用來拜祭神明的花炮，如今也多是粗製濫造，取個形式。

欲從父母口中重拾傳統的意義，如問一句「拜神為何要燒香？」卻發現他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。但何以到了他這一代，意義變得如此重要？「這是世界的潮流。我們也是近幾十年才開始講環保。資本主義的出現，資訊的爆破，互聯網……如今太了解世界，有太多硬知識，知識或者資訊太快出現，太理性，以前一些怪力亂神的事物會變得假。」他說。

### 對舊事物 香港很無情

辨認傳統的經緯軸，要挽救或放棄，同樣要選擇；鄧國騫也問自己：「到底是走得愈遠愈好，還是留下來維繫族群好？」遠走是隨波逐流，跟上這全球一體的潮流；維繫則要確確實實地回來經營生活，對抗流逝，重拾習俗的細節與意義。對此，他矛盾，也無力。

「香港是個絕情的地方，不停剷、不停掉；很多古蹟都不能保留。以前香港有很多古堡，很多都無晒。不知是否爲了『去殖』，但你會覺得很多獨特的景觀，我們沒有珍惜過。」他說最近在做一個有關孫中山的研究，發覺舊事物在香港消逝得尤其急速。

他慨嘆現代社會的冷漠，群落的疏離；新舊交替之間，傳統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只會更快隕歿。而他的作品如就同他對傳統「既相信又懷疑」的態度，往往是迂迴又複雜；但其中挪用的概念大多源於生活，而這與自己的原居民身分是無法切割的。

### 不合時宜的身分有些文化還需要問

傳統逐漸步向失落，原居民身分對他來說也已經步入末代，他說：「這個身分可以消失，無所謂；但當中有些知識和文化，我們需要去問爲什麼；其實也不只是原居民，而是香港走下去的路是什麼？」

但人人都如他這般清醒嗎？其實，同一堵圍牆內，還是有同代人覺得要及早添丁，繼承「傳統」賦予的家產和身分。他笑說總有簡單的人；正如放諸大環境，看着香港一國兩制逐漸消亡，依然有營營役役，活在自己另一個世界的人一樣。

屬於鄧國騫的相信與懷疑，生活總是矛盾，自我總是搖擺不定，但有些最根本的問題，清清楚楚就在眼前。

“新界有兩種人。一種是有能力獨立生活的，個「底」清潔，你就不想去理鄉事，如果理就要承受畀人搞的風險。另一種是有底有勢力的，用盡各種方法搵錢。但其實新界大部分人是平民，敢怒不敢言。— 侯智恒”

“如果不是房地產市場過熱，利益誘因大，我相信原居民不會輕易破壞自己土地。到底香港高地價政策是元兇，還是原居民是元兇？— 羅惠儀”

### Part 3 新界新力量

「新界」兩字的「新」字，既代入了殖民者佔有「新領土」的目光，亦彷彿意味一種恆久變幻、革新的狀態。「新界」一直自我更新，亦容許兩種力量不斷的拉扯、辯證，成爲新的「新界」。這種新力量，可以是復耕一條已垂垂老矣的廢村；也可以是一個平地一聲雷的年輕議員，大無畏的提出改革。

### 城鄉共融?荔枝窩復耕的經驗與疑問

六年前回流返港的David曾偉強曾回荔枝窩住幾晚。村內頹敗荒廢，David住着住着有點害怕，還是離村了。但今天的荔枝窩竟復活過來——如今有一群城市人走進這與世隔絕的小島，在村內做農田復耕的工作，說要令這條百年鄉村重現生機。原居民與非原居民之間，如何在同一片土地上共融？這是新界未來的新可能嗎？

### 復耕大計：從一次郊遊說起

位處新界東北、沙頭角慶春約七村之一的荔枝窩，是一條逾300年歷史的客家圍村。就如新界不少偏遠鄉村，村內兩大族人——曾氏及黃氏村民於1970年代遠走他鄉，村落一下子荒廢30多年。荔枝窩的復耕計劃源自喜歡行山的林超英，這位愛好自然的前天文台台長有次經過荔枝窩遇見年過半百的David。13歲隨家人移民德國的David說，小時候荔枝窩村很熱鬧、很團結，「所以我很喜歡這條村，是第一個回來修祖屋的村民。」David向林超英提起復興鄉村的想法，兩人聊着聊着，幾年後便促成了復耕計劃。

復耕計劃從構思到落實，林超英找合作團體、籌募資金；David協助聯絡村內原居民。如今整個計劃的協助機構有港大嘉道理研究所、香港鄉郊基金、綠田園基金、長春社，以及荔枝窩原居民，可謂是又有城又有鄉的農耕力量。

### 人煙罕至的偏遠荒村

荔枝窩沒有車路連接，進出十分不便。除了周末在馬料水碼頭開出的渡輪之外，平日出入荔枝窩只能經烏蛟騰步行2小時的山路，或者經沙頭角禁區乘搭水上的士。

因交通不便，如今即使多了人在村內做復耕工作，平日也是人煙稀少。而且復耕參加者多是「半農半X」的形式，他們在市區有自己的生活，所以很少人會在村內長住。即使是回流的村民，也並非每日都會在村內，所以入村能遇見多少人惟有碰碰運氣。

### 棄置與發展之間——復耕作爲出路

於是，我們就隨復耕計劃的項目經理戚小姐入村碰運氣。經沙頭角禁區乘搭街渡進去，戚小姐在路上解釋整個復耕計劃。她說構思荔枝窩復耕計劃初期，考慮比較直觀，農地持續荒廢的結果只有兩種——變成荒野或發展獨立屋，但這兩個極端都不是理想的選擇。比較理想的作法就只有恢復農地的耕作，從而進行自然環境的保育工作。

但是，村落荒廢，村民多移居海外，即使回流亦是退休年齡，未必願意再投身辛苦的農務工作，原居民復耕是幾乎不可能的事。所以，邀請願意務農的城市人來參與復耕工作，就成了基本的構思——「如今也有不少城市人想耕田。」她說。

落實成具體的實踐，就是由鄉郊基金向原居民租用農田、並招募開墾農地的參加者，由綠田園基金提供技術支援。

計劃向參加者提供12個月的農耕訓練，並要求他們提交種植、生產及綠色經濟建議書。免田租之外，還有農耕及村內生活支援。在不侵害耕地環境的前提下他們可自行決定想嘗試耕種的農作物，收成也全盤自行處理。

於是，2013年年底開始，農田上就有了新生命——新的面孔、新的作物，以及新的營運模式。

### 瘦田有人耕 野豬食霸王餐

但復耕工作談何容易？小小的一粒種子落地，在肥沃的農地尚且要農夫日曬雨淋的操持；荒廢了30多年的農地，更需要月復月、甚至年復年的毅力，等貧瘠的泥土慢慢回復過來。

有時，辛苦種出來的農產品還需面對「入侵者」的威脅。復耕參與者紀子爲此煩惱：「辛苦種出來的芋頭，自己還未嘗過味道，就讓野豬一晚吃個清光。」她說那腳印和破壞力不是一隻半隻野豬能辦到的，起碼有一窩野豬。芋頭田過後是番薯田，野豬還是可以把整片田的收成吃掉，一點不剩；那些牠們不吃的農作物，也被挖了出來，斷的斷，傷的傷，一片狼藉。

於是大家就在農田外圍起了一圈圈的電網，希望嚇走這些「食霸王餐」的壞蛋。但是，沒有多大成效，電網震不住野豬的霸道；來自大自然的挑戰，千百年來從沒改變。

### 新舊村民的相處哲學

動植物在自然界互存的哲學，人工的農地或自然的郊野，如出一轍。同樣地，城鄉之間的關係，文化對撞，人際間要怎樣相處，大家同樣要面對。戚小姐笑說：「當然有矛盾，原居民租出了農田，這地還是他的，他在乎；會對在農田上進行的耕作有意見——為什麼你要在這兒種木瓜樹？也未必理解如今的耕作模式，所以必須互相溝通解釋。」

「城市人初時入村，未必知道或者明白村落遺留的文化習俗，例如細節上要遷就和注意村內的風水信仰。」所以她說大家都在經歷、摸索，亦在學習。「即使是復耕參與者，他們有時也在田裏吵架。」她指了指在飯桌上言談甚歡的農夫說，其實大家還在嘗試。

### 文化導賞：「所謂鄉村，不只是屋和人」

城市人進村耕田，在農地上鋤呀鋤，翻泥除草。提議復村的David對耕田無興趣，他如今在村內負責文化導賞，向遊客解說客家圍村文化。他說：「我很喜歡聽故事，以前村內的老人家說故事，我就在一旁聽。如今我有很多故事可以講。那些教育團入村想要什麼故事，我都可以給他們講。」

David這文化導賞的工作，戚小姐說是復耕計劃開展之後的反思，覺得自然環境的保育之外，亦要着重鄉村的社區發展，要以鄉村為本位。她說：「所謂鄉村概念，不光只是屋和人，還包括農地、山和水，是一整個系統。」故復耕不只是農田、也是社區的耕耘。他們開始思考如何重新發掘社區資源，活化村落的歷史文化，營造更豐富的鄉村社區經驗與內容。於是有了後來的客家圍村文化及自然生態的文化導賞活動。嘗試多方面展開荔枝窩的經濟模式，在農業的自給自足之餘，還能發展生態旅遊，甚至提供生態教育的場域。

### 要讓原居民看見賣地以外的選擇

整個計劃運行至今已經3年，農田還是太瘦，有時種了很久的農作物也開不出個所以然。距離村落社區的自給自足、持續發展，戚小姐坦言「還有一段距離」。所以她預計計劃的資金耗盡後，還需要申請政府的資助，繼續維持項目的發展，「但這不是什麼壞事，慢慢來吧，不必急，也不能急。」她說。

面對香港的農業發展，她語重深長地說：「沒有一個地方如香港這般，農業在短短這100多年間飛快衰敗。日本、泰國、台灣的農業都要遠比香港完整。」她感慨香港農業式微，糧食全依賴入口，政府毫無面對糧食危機的意識。

香港的農業問題，不單只是農田荒廢；其引申的農地破壞，棕地面積（目前接近1,200公頃）不斷擴大，環境污染等等。戚小姐指大家總是希望保留農地，要求農地不發展。但是，卻沒有提供任由它荒廢以外的出路，這樣對地主亦不公平。「一塊賣1,000萬的地，你用年租700元向他租來耕田，你用什麼理由說服他不賣地？當然，什麼是合理的價格要再商量，但是我真的覺得，我們要讓原居民看見賣地之外的選擇。其實原居民當中，也是有人很愛惜自己地方的。」

### 朱凱迪：新界是香港未來的主要戰場

揭發橫洲事件的朱凱迪，成為立法會票王，也成為鄉事派眼中釘。他們說：「你個外人憑咩搞我哋家事！」朱凱迪卻說，新界問題是全香港的問題。作為全港唯一一個提出要改革新界的政治人物，我們請他談改變：「鄉議局是要改革，不是取締；丁權亦不是關鍵，關鍵在鄉村議會的組成結構。」

### 「新界管治就是跟大佬」

殖民時代以降，鄉議局的地位一向舉足輕重；作為諮詢團體，卻一直發揮憲政組織的影響力。究其根本，朱凱迪說：「殖民地時代，新界開始建立了一套勾結式政治，特區政府一直不用很強的力量去壓制這種力量時，反而從梁振英開始，更吸收了這種力量，引入成為香港管治力量的核心部分。」因此，鄉議局的政治權力未曾瓦解。

這個主導新界發展的團體，由始至今都不是一個民主體制，朱凱迪續指：「新界的管治（一直是）主從模式。簡單而言，就是跟大佬。他們不是講民主或理念，而是『誰是大佬』、勢力覆蓋範圍、以及『如何籠票』。這種主從關係，從一開始到現在都無變過。」

主從模式的緣起，1923年港英政府制定《民田建屋補價條例》，要求村民在農地上建屋要改地契、補地價。於是新界鄉紳群起反對，並促成了鄉議局的前身。朱凱迪說正是這個歷史因由，也就定性了鄉議局的角色，「是一班地主、亦即是大宗族，集合力量去爭拗——作為地主，他們有什麼權？」

### 鄉郊議會的重要性

面對政權的收編與吸納，看鄉議局如果只停留在鄉紳齷齪狼狽的層面，大概忽略了新界一直以來的戰略位置。殖民地時期，新界是用來抵擋外部勢力的緩衝地帶；97後，又成為了中港融合的主要場域。朱凱迪說：「新界未來發展是香港主要的戰場，誰在控制這場戰爭？民主派無人在（制度）裏面。而這種（鄉黑）力量正在被政權收編，逐漸主流化。所謂的取締鄉議局說法，香港人沒有行動，紙上談兵。或者你會取笑諸如梁福元等人，其實他們很快退休，換了新一批人，形象自然改變。香港民主運動在廣度和深度上的思考都不足。就如功能組別，你不去玩這個遊戲是贏不了的。所以你要去拉闊空間和戰線，鄉議局是其中之一。」

現實的政治考慮之外，朱凱迪主張改革而非取締鄉議局，還有城鄉共生的考慮，「我覺得需要存在一個鄉郊議會，城市人心態總想取締別人，這心態太城市化。（其實）要去了解這個鄉郊有自己不同的產業、政策，需要一些怎樣的補助和支持。他們（鄉村）應該有自己的議會。」

### 改革的契機：立法會新戰場

所以，看新界問題，丁屋丁權不是關鍵，關鍵是鄉議局以至鄉事委員會的結構。「最關鍵是（鄉村議會的）結構誰人揸莊。我們可以透過玩同一場遊戲改變這結構，這是真的戰場。北京和特區政府最不想的就是一個民主的鄉議局。你走去反丁屋，其實地產商好開心，因為在新界少了個競爭者。所以我覺得最關鍵都是民主。」

民主是改變的關鍵，而改革的契機，朱凱迪說：「我贏了立法會就是契機。在村內很難開這些戰線，我要在立法會開這些戰線出來。要令這些問題成為問題要有人講，要有人在立法會提出來才能醞釀。」他說改變現存鄉村議會不容易，那是一個封閉的制度，外人對鄉委會以至鄉議局的委員任命都無從得知。要一步步來，但2018年的村代表選舉是其中一個機會。

但這條路要有同行者，不能只有他一個人，「就像踢足球，只有教練一人是無用的，要有其他人落場。無人落場，有戰略也無用。還要踢得好，你明知好難踢，可能輸硬，都要落場。」但大家落場的動力從何而來？「同所有民主運動一樣，都是出自關切。你不想放棄一個地方，要挺身而出。當然你會計成本與代價，但你最終還是要出來。我覺得好多人不想放棄新界同香港，但大家有困難，體制很可怕，你無條件出來時無力感好強。但任你再無力，你有機會都是可以出來的。」

這牽一髮動全身的新界改革，朱凱迪說改革鄉議局之前可以先從鄉委會入手，但實際操作也是見步行步，慢慢摸索計劃和戰略，「點做當然好複雜，是一條村一條村地做。實際步驟有很多細節要考慮，因為就算有村民同意改革鄉委會，村內亦有不同力量，改變還是很複雜。但總體個方向是很清楚。」他說自己還是相信民主大過地主和財主，在這個沒有什麼希望可言的大環境下，希望是「既無又有，既有又無」的。

撰文：吳世寧、鄭秋嫻

攝影：鍾偉德